学术思想

清史研究现状中的若干问题与解决方法

曹　雯

[摘要] 历史研究的基本问题无外乎两样。一是史料，一是史观，抑或研究方法。目前，国内学者津津乐道于研究方法一如西方学者热衷于创建研究方法。然而，历史的客观叙述终究基于丰厚真实的史料，合理完美的理论是历史研究的工具而非目的。无论如何，挖掘、甄别史料应是每个历史研究者的首要任务。西方学者按照其注重逻辑的传统往往痴迷于研究方法论的构建，多以为历史研究不仅在于叙述过去的历史，还应对未来做出预想。若此，中国传统的编年体式的历史叙述，在他们的眼中自然显得平铺刻板而缺乏科学性。然而，如果我们将历史界定为“过去的状态”，那么，我们对史料乃至历史真实的追求实应凌驾于研究方法的创建之上。

[关键词] 史料　研究方法　清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 (2007) -04-0063-07

Questions and Solutions in Studies of Qing Dynasty

Two basic keys to history study can be listed as history document and history viewpoint, or research method. Nowadays, just like the western scholars focusing on developing research method, our domestic historians have the same enthusiasm in research method. However, any theory, no matter how perfect it is, could only be seen as a tool for history study. An objective conclusion is fundamentally based on true and abundant history documents. Therefore, it is an initial task for historians to explore and select history documents. Western historians pay much more attention to the built-up of methodology due to philosophic traditions. Their understandings of history study are not only the presentment of history, but also forecast for the future, which answers for the reason why they feel that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c records in chronological style are boring and lack of scientific values. Whereas, as we define history as a state of past time, we have to put more stress on pursuit of documents and truth in history, other than built-up of methodology.

2006 年 8 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联合在京举办以“西学与清代文化”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共计 110 人，提交论文 80 余篇，涉及内容方方面面，可谓近年来中国清史研究状况的综合展示。笔者以此为契机，试图就清史研究现状中的若干问题以及解决方法发表一些看法。

一、受困于方法论的清史研究

历史研究的基本问题无外乎两样。一是史料，一是史观，抑或研究方法。在我国，民国以后的中国史研究，尤其对 19 世纪以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多吸收借鉴西方近代的历史研究方法，以为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只专注历史

[收稿日期] 2007-1-10
[作者简介] 曹雯 (1968—)，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讲师；北京 100872

材料的编年式整理，而缺乏对历史事件的综合叙述与解释。这种观念影响至今而经久不衰。目前，国内学者津津乐道于研究方法一如西方学者热衷于创建研究方法就是一个明证。学者们似乎达成一个默契，即如果能探索出合理而可靠的研究方法，就能描述出真实而可信的历史状态。既然研究方法如此重要，每位学者在开展自己的领域研究之前，实有必要确立个人的研究方法，并且这个方法应尽量避免与他人雷同。而当这种思维方式成为一种惯例之时，它所呈现的学术状态就是各种名目繁多的方法论抑或历史观泛滥于世。其结果导致被叙述的历史对象往往随着方法论的改变而改变，历史真相反而遗失在重重方法论之中。

在上述学术背景之下，夏明方提出《十八世纪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中国中心观”主导下的清史研究反思》一文就显得尤为引人注目。在该论文中，他就目前海内外清史研究者们在“中国中心观”的主导之下如何刻意构建18世纪中国的“现代性”这一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反思。众所周知，由美国学者柯文于上世纪80年代在其专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日本译本为《知的帝国主义》、台湾译本为《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回顾与前瞻》)中所提出的“中国中心观”给美国、以及世界各地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带来了非凡的影响。二战结束以来，以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为首所确立的“冲击——反应”论一度成为主导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叙事方式。而柯文通过自身的研究积累，挑战了上述研究方法，提倡应“在中国内部发现历史”。柯文的举动是在费正清理论已根植美国汉学界之后所作出的反弹。这一反弹不仅在美国内部引起震动，它所涉及的研究对象——中国亦受到其不可忽略的影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中国，尤其是大陆，并不是在彻底消化了费正清理论之后又迎来了柯文方法，即“冲击——反应”论与“中国中心观”几乎是一前一后进入中国。面对两种叙事方法，“中国中心观”无疑更能引起国内史学者的共鸣。于是，“中国中心观”主导下的各种研究方法纷纷出笼。但学者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无论是费正清，抑或是柯文，其所叙述的中国近代史皆以西方现代化元素为评判标准。这意味无论接受以上哪种方法，我们对历史的叙述都将演化成一种于历史中百般寻找现代化元素的行为。正如台湾学者李纪祥所指出的一般，“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是对美国汉学界的回顾反省与批判，并非是对中国学者的建言书”。如果说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论是一种彰显的西方中心史观，那么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可以说是一种比较隐蔽的西方中心史观。柯文要进入中国去观察中国的出发点并不坏，然而他在中国所发现到的历史是：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同样存在近代西方社会所张扬的那些现代化元素，并且这些元素的存在并非如费正清所言是在西方冲击下的产物。即当费正清观察到近代中国因缺乏代表西方先进性的现代化元素而认定中国社会处于停滞状态之后，柯文却发现在近代中国传统社会中并不缺乏现代化元素而重新叙说中国社会内在的发展动力从来没有中断过。很显然，现代化元素的有无是他们各自做出不同判断的依据。也就是说，现代化元素成为判断无论是中国社会乃至世界其他地域社会进步抑或落后的价值标准。而当这种价值标准隐藏在柯文的“中国中心观”之中在海内外清史研究学界得到广泛传播之后，就出现了夏明方在其论文中所提到的种种奇怪现象。他指出，“中国中心观”的教条运用已经深入到清史研究的各个领域。他举例到，对于中国18世纪历史的叙述，社会史研究者发现，即便是在程朱理学最发达的江南地区，女性、尤其上层社会的女性已经具有与男性同等的地位；经济史研究者断定，若以18世纪中叶的西欧为标准，18世纪的江南可以说已是十分“近代化”了；研究清代国家职能的学者表明，清代中国早在西欧各国成为近代福利国家之前，就已经实行了一系列复杂而有效的“保障人民起码生活权利的物质利益手段”，明清中国在国家社会福利方面的表现有时甚至超越欧洲；政治制度史研究者则将18世纪的中国定性为地方自治型社会。更有甚者称明清福建的乡族组织即是乡族资本主义的表现，而“宋代基本上相当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对中国乡村基层控制模

式的认识也由以前的“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转变成“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造乡绅，乡绅皆自治，自治即近代”。

如此，遗憾中国在20世纪错过发展西方现代化道路几乎成为一种普遍的认识。这种认识带动历史学研究者们自觉或是不自觉地去寻求中国历史中的现代化元素抑或挖掘阻碍中国接受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元素。在本次会议的提交论文中，亦不乏其例。王先明在其论文《晚清“中体西用”论的再思考》中，通过对“中体西用”观的重新定位，指出晚清中国为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亦曾做过百般努力，但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对本国文化难以进行批判与取舍，导致他们在接受现代化元素时顾虑重重，错过了使中国尽早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时机。李志军在其《西学东渐的策略选择及历史进程》一文中则称西学东渐是我国明清以来学术文化近代化、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但作者却忽略了一个历史事实，即甚至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学术文化的主流依然是“中学”，而非“西学”。李帆在其论文《西学视角下的戴震义理学——以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胡适对戴震义理学的解说为核心》中，认为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胡适等人从西学角度出发对戴震义理学所作出的重新解说可谓功不可没，因为他们恢复了戴震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哲学史）上的完整形象。于此，作者在吸收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胡适等人的观点之余，其实对清代考据学家戴震又作了一次西方现代化元素的探寻。作者没有意识到他所列举的上述清末民初文化名人在对戴震实施重新评价时，其背后无不带着个人的政治追求，而作为一个历史学研究者，以特定时代人的价值标准来评价历史中的戴震是种危险行为。然而，漆永祥所提交的《从〈汉学师承记〉看西学对乾嘉考据学的影响》一文却表现出与上述研究轨迹相抗衡的态度。在该文中他断然否定西学对乾嘉考据学研究方法以及当时人们的世界观产生过重大影响。作者撰写此文的意图显然是要说明不应过度夸大西学在中国乾嘉时期的影响，因为西学对当时中国的影响多在天算学范围内，即便在懂得一些天算学知识的考据学家眼里，天算学亦只是中国传统经学研究的辅助知识之一。本次会议的主题是“西学与清代文化”，其宗旨是要探讨在清代中国社会里，西学究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何种程度的影响。对于这种影响度的不同把握导致与会学者间引发上述争议。清前期无疑是一个以中国文化元素占据主流的社会，无视这一历史事实而夸大这一时期西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即是“泛近代化论”的一种表现。这同时反映出我们对本土中国文化元素缺乏信心。即中国的停滞表现在缺乏现代化元素抑或特征，如果我们能找寻到那些元素抑或特征，中国社会的历史就不再是静止的，而是趋于一种移动前进状态。这使得我们应该进一步深思文明是否有高低之分，抑或文明是否以个人在社会所占据权力多少来划分高低。西方近代社会使普通人获得解放，而东方传统社会仅仅使德才兼备的人获得解放。孰是孰非不能以“先进性”这一概念来作出简单判断。最低限度，研究18世纪以及之前的中国史研究者不应过多为西方现代化元素所困惑。如果摆脱现代人的价值观念，融入历史中去看待历史，以当时之国势，中国文化元素无疑占绝对优势，亦如当今“现代化”之价值观占据世界文化主流一般。

本次会议中，同样对费正清之“冲击——反应”论以及柯文之“中国中心观”持有异议的台湾学者李纪祥以《近代观与西学观——魏源研究的多元面向与反思》一文，对重建中国历史的叙事方式进行了探索。在其论文中，通过晚清对魏源的多元化叙事这一事实的存在，探究了当今学界是如何将对魏源的叙事由原本的多元化转变成了单一的现代化叙事。究其原因在于学者们忽略了历史事件的连续性，而之所以忽略历史事件的连续性又在于研究者们不能走入历史去观察历史。李纪祥在走入历史对魏源作出一番观察之后，断然否定魏源并非如当今学界所公认的那样是开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领军人物，并指出魏源的思想与其说是西方冲击下的产物，不如说是顺着清代思想发展的脉络传承而下的结果，魏源思想中所包含的那些现代化元素只不过是中国士大夫换位思考之后的自然体现。即“从另一个非

传统的模式即海洋模式并参考西洋诸国当时之成果，来对中国以及周边状态进行著书立言，本来就是历朝历代都会出现以及发生之学术方式，并不是所谓鸦片战争之产物”。李纪祥的领悟来自沟口雄三的中国史观。沟口是反对将中国近代史分段而论的日本著名学者。沟口强调中国的近代与其说是西洋冲击下的受体，不如说是旧中国的蜕皮过程。因为如果以三百年为单位进行观察并加以分析的话，中国的近代对于来自西方的冲击所作出的那些反应（例如洋务运动抑或变法运动），基本上是旧中国运动的连续型。由此，沟口认定中国自身的内在运动并没有因为受到外力的压迫而改变方向。沟口的言论表现出在反驳费正清所代表的西方中心史观时日本学者所坚持的立场显然与美国学者不同。柯文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找寻到西方现代化元素而证明中国自身内在的运动并没有停滞，但沟口在强调中国运动的连续性时，所要表达的是中国文化元素并没有随着西方现代化元素的进入而丧失其发挥功效的作用。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近代化过程虽然要比中国进行得迅速而彻底，但却将“东方道德，西方技艺”奉为座右铭，如果否认中国文化元素的原动力便如同否认其所倚重的东方精神。从日本的立场进行反弹的代表学者尚有滨下武志。滨下的叙事方法是通过说明亚洲历史的连续性来求证中国历史的连续性。他指出，“以中国为核心的与亚洲全境密切联系存在的朝贡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朝贡贸易关系，是亚洲而且只有亚洲才具有的惟一的历史体系”，在欧洲进入亚洲之时，首先要面对这一特殊贸易体系，因此，亚洲近代开始的“契机”并非仅限于西力冲击，有必要从亚洲自身中“寻找内在的构成要素和内在动因”，亚洲“和西方发生的新的关系，顶多只能算是亚洲历史发展的契机或手段而已”。滨下从亚洲经济贸易体系的连续性看到亚洲近代历史的连续性，继而读出中国近代历史的连续性。总之，在滨下的眼里，贸易利益的互动是保持亚洲历史连续性的原动力。当滨下把中国文化元素简化为经济影响力时，其目的是为曾经一直游离于亚洲传统政治秩序之外的日本在亚洲内部争得一席之地。

针对日本学者对西方中心史观的反思，促使我们应该从中国的立场，更确切地说从中国文化元素重新考量西方历史研究方法对清史研究抑或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产生的影响。笔者提出中国文化元素并不是要赞同夏明方在其文中所指出的那些意欲将现代化彻底打回老家去的“天下秩序”观持有者。清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在于西方现代化元素的参与。这种参与由微不足道发展至与中国文化元素博弈，又发展至胜出中国文化元素而招致中国文化元素的衰退。沟口雄三提示我们应该以三百年为周期观察中国社会的变化，并坚信中国文化元素的退缩只是暂时的历史现象。鸦片战争距今尚不足两百年，一百年后中国文化元素是否会复兴、或以怎样的面貌复兴是一个令人瞩目的事情。然而，中国文化元素复兴与否并不应该成为我们在对近代中国历史作出叙述之时忽略西方现代化元素所带给中国社会的影响的理由。反之，在叙述这种影响之时，却又不能过度夸张西方现代化元素的参与。笔者以为如何把握好西方现代化元素对中国社会的参与程度是能否获得客观而合理的叙事方法的关键所在。我们不能无限向往现代化，若此即等于说现代化所包含的元素皆成为文明高度发展的特征；我们亦不能过分强调中国文化元素的自身独立发展的连续性，若此即等于说中国文化所包含的元素从来不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李纪祥的尝试就是没有能够把握好其中的“度”。他以魏源为例，反对用单一的现代化叙事方式将魏源曲解为现代化的开端人物，并以历史连续性为着眼点，说明魏源本身所具有的现代化元素多来自中国内部历史发展的动力，而非为西力影响所致。在李纪祥的意识里，现代化元素依然代表着进步，只不过这种进步来自中国自身内部的发展动力。而在日华人学者孙江则做了一个走入历史场面看待历史事件的较为成功的尝试。他在《作为他者的“洋教”——关于的阐释》一文中，以清末教案为考察对象，重新对基督教与晚清社会的关系进行了叙述。即“当基督教信仰通过信徒个人带入宗族社会后，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围绕祖先崇拜等的冲突已经内化为宗族社会内部的矛盾。因此，不能简单将教案一概称之为‘宗教冲突’，几乎所

有的教案背后都存在着一些非宗教的地方性因素，教案是宗教感情的龃龉和日常生活矛盾交织碰撞的产物。当这种碰撞上升为帝国统治和列强的条约体系之间的冲突时，教案便越出地方性的限制，而成为一连串中外纠纷关系链上的一个扭结。"孙江既没有过度夸大基督教在中国传教的罪恶，也没有用鄙视的态度对待中国的宗族社会，力求追述发生在地方的真实景象。

进入近代社会（西力东渐）以来，中国一直面临如何处理西方现代化元素与中国文化元素共处抑或融合的问题。当我们今天力图客观叙述当时的历史状态时，仍然面临同样的问题。总之，既不过分张扬中国文化元素的生命力，亦不回避伴随西力进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元素是把握上述两种元素处于碰撞时期的历史真实状态的前提。反动抑或不反动，都不能走入一种极端，过去中国传统社会只认同中国文化元素，导致现代化发展的滞后，而目前无视中国文化元素、一味追寻西方现代化元素之行径亦不可取。尤其，随着大量西方学术译著的问世，虽然为我们更多了解世界中国史研究的状态提供了诸多便利，但不做甄别的全盘吸收所带来的恶效应已经显现，"中国中心观"所体现的"泛近代化论"就是其中的一种形式。于此，与会学者王俊义以《庄存与复兴今文经学起因于"与和珅对立"说辨析——兼论对海外中国学研究成果的吸收与借鉴》一文，通过实例说明，即便如清史研究名家艾尔曼，其所考察出的结论有时亦与历史真实不符，并以此提醒国内学者，盲目地吸收会导致我们已经澄清的历史事实又回到模糊不清的原点。

然而，历史的客观叙述终究基于丰厚真实的史料，合理完美的理论是历史研究的工具而非目的。我们在畅谈各种方法理论之余，更有必要下足功夫去挖掘历史资料。无论如何，挖掘、甄别史料应是每个历史研究者的首要任务。

二、史料挖掘领域的开拓

史料挖掘领域的不断开拓是本次会议的一个亮点。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不断扩大，大陆学者查访遗留在海外的中国相关史料的机会增多，为进一步推动中国史研究带来可能性。与会学者华林甫所提交的《英档庋藏近代中文舆图的价值》一文，就是依据自己在英国访问期间查阅收藏于英国国家档案馆的一批中文舆图而写成。地图作为史料的价值性已被学界广泛认同。华林甫在英国国家档案馆所查阅的这批中文舆图凡 71 种共计 124 幅，其中绝大部分属 1850 年代广东地区的军事作战地图，内容多涉及两广天地会起义，尤其反映各路红兵围攻广州城状况的地图，可利用价值非常高。另外尚有少量关于早期太平天国活动状况的舆图。这批舆图原属两广总督衙门的文书，于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占领广州期间为英国人所掠走。因地图所包含的史料内容极为丰富，是研究历史事件的绝好材料。作者预示通过对这批舆图的整理、分析，必将揭示早期太平天国、广东红兵起义等历史事件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并有望纠正一些已被学界认可的结论，以推进该方面的研究。我们期待作者通过对这批舆图的整理能陆续提出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另一位与会学者高王凌也利用自己在访问斯洛文尼亚期间，偶然访查到一批由当地学者从欧洲各地陆续收集到的有关乾隆年间在京耶稣会传教士刘松龄的史料，并以此为据写成《刘松龄，最后的耶稣会士》一文。这些史料中包含刘松龄当时寄往欧洲的各类信件。通过这些信件，作者得以重新观察乾隆年间在京传教士的处境。例如，从"中国人对我们科学的兴趣越来越少，皇帝评价最高的就是欧洲的绘画，其他的并不怎么重视"，"他在所有省份完全消灭基督徒，同时在北京做一个保护我们的样子。在这点上，是和他的父亲、爷爷一样的。"等等内容来看，西学、尤其是一向被学界认为对中国影响颇大的天文算学在当时中国的地位并不彰显。

作为新史料发掘前沿，张西平提交的《〈耶稣会在亚洲〉档案文献与清史研究》一文值得关注。这批原藏于葡萄牙的《耶稣会在亚洲》档案文献被作者视为研究中国清代天主教史和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及清代社会史的重要一手文献。文献内容包括耶稣会总会的年度报告书、教区内的通信等等。因投入时间

有限，作者仅将在整理耶稣会总会的年度报告书过程中所发现的新史实做了极为简单的介绍。例如该文献所涉及内容非常广泛，关于明清鼎革、中国教区的“礼仪之争”、清代社会以及对外关系的状态等均有记载。不过由于该批史料所涉及语种（拉丁文、葡萄牙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以及法文）繁多，利用难度颇大，对清史研究的推进能发挥多大作用取决于其被开发、整理的程度。

历史概念的界定直接影响历史事件的表述。黄兴涛历年来于此所作出的贡献不容忽视。在本次会议中，黄兴涛又以《清代西方美学观念和知识在华传播考论》一文，考证“美学”这一概念是如何进入中国，并为国人所接受的。作者以为王国维的有关思想活动作为中国近代美学的开端，是一个很值得尊重的意见，但断言王氏最先在中国使用“美学”概念和最早传播西方美学思想却未必妥当。他指出，明清之际天主教传教士的中文文献中，已提及西方“美”的意识，但在中国，近现代学科意义上的“美学”一词的使用，要到晚清时期才出现。经过严密考证，作者认为“美学”这一概念，虽然最初是从西方及日本的教育与教育学的译著中率先引入中国，但“美学”这一词汇的最先利用者却是十九世纪以后来华活动的新教传教士，即德国新教传教士花之安在其中文著作《德国学校论略》中，首次在现代意义上创用中文“美学”一词，该书也大概是晚清中国正式介绍西方美学的较早文字。在1875年，花之安在《教化之义》一书中，又用及“美学”一词。在花之安之前，似乎还未见有人这样用过“美学”二字。而日本的中江兆民迟至1883年在翻译《维氏美学》一书时才较为正式使用“美学”这一译词。不过，就笔者所知范围，在明治初期，曾有大量汉译西书传入日本。这些汉译西书中是否包括上述花之安的两本专著不得而知。中江兆民在运用“美学”一词时是否受过汉译西书的影响更加需要历史考证。

从两位与会学者先后讨论开封犹太人问题这一现象，提示对开封犹太人的研究是目前学界的一个热点。耿昇以《西方人对中国开封犹太人的调查始末》一文，主要介绍了目前开封犹太人研究所依赖的文献史料。这些史料基本由西方人对开封犹太人持续三百年之久的调查资料组成。最早对开封犹太人进行调查研究的，是以入华耶稣会士为主体的西方天主教各修会的入华传教士们，后期则包括新教等多个教会的传教士、商人、旅行家以及犹太人自己。作者指出，西方人对开封犹太人持续开展调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想证明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上帝的子民”；二是力图通过查阅开封犹太人的原始《圣经》，以求证明犹太人曾经篡改过当时流行于世的《圣经》。自宋以来就落户开封的犹太人，作为异民族族群，在清朝咸丰年间以后突然衰落，并被迅速同化。作者利用手头资料判定其被同化的原因是缺乏有效的经济援助。这个结论给人留下的疑问是开封犹太人为什么之前没有因为经济的原因被同化呢？同样就此问题展开研究的另一位台湾学者查时杰则通过田野调查获得自己的结论。他在提交的《从再造到没落——开封犹太教会堂在明清两朝的历史（1644－1860）》一文中指出，犹太族群的特点之一就是同化的程度远比其他民族的移民要小，在中国开封地区的犹太移民，自十二世纪以来，历经宋、元、明、清，数百年来，始终能维系住他们的族群与文化于不坠，与“犹太会堂”所发挥的宗教运作功能息息相关。咸丰十年（1860）“清真寺”（开封犹太会堂）因该年发生的黄河大水灾而遭冲毁，而坍塌的“犹太会堂”却迟迟不能获得复建，使得这个族群被当地文化加速同化。查时杰以开封犹太人的经历为例，印证“犹太会堂”的存在是“犹太文化与民族”得以保存并延续的保障。在田野调查过程中，他从当地现存的几块碑文中解读出开封犹太会堂在明清时期曾经几次得到再建或修缮，以此越加坚信开封犹太人实衰于“犹太会堂”之毁坏，更亡于“犹太会堂”之不能复建，揭示出开封犹太民族被同化的根本原因。查时杰的研究个案表明，我们在强调文献史料的同时，一定不能忽略田野调查的重要性。田野调查的价值性在海外普遍获得认可，我们在此方面的努力尚有欠缺。

另外，史料的合理利用仍然是每个史学研究者时刻所要面临的挑战。李华川在其《清

朝前中期国人对法国的认知》一文中，谈到《清史稿》“法兰西”志中将法兰西与佛郎机和葡萄牙混淆是由于相关内容承袭了乾隆时期官修的两部政书《皇朝文献通考》、《皇朝通典》中的讹误，而造成这种讹误的原因，既是法兰西与佛郎机的发音相似，也是两部政书的编者过于依赖旧有文献，缺少实地考察的结果。作者通过这一混淆事例,来印证清前中期的一般士大夫对于法国缺乏了解,作者由此反思清人不能以平等态度对待另一种文明,从而失去认识欧洲的机会。作者显然是以当今价值观为基准评判了这一历史现象。在清前中期，中法间通过传教士的介入所进行的交流并不能称作两国间的正常交往,互相产生误解不可避免,加上以当时中国人所具备的地理知识以及在文化上所拥有的优越感,出现上述作者所提到的失误并不为过,而仅以此为凭据批评清人有失公正。再,王宪明、张伟良《两个法国人三个中国人与 18 世纪法国两种中国观的形成》一文,对 18 世纪中后期分别以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和法国重农派思想家魁奈为代表的两种中国观进行了整理分析,认为两派之间围绕着对中国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不同认识和评价所展开的争论,对法国乃至欧洲有关中国形象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并通过整理分析上述两人分别与三位曾经旅居法国的中国人接触后对他们各自的中国观所带来的影响,认为他们对中国认识上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洲不同宗教派别之间的分歧在欧洲中国学者之间的分歧。作者的观察角度比较新颖,文中所涉及的三位中国人也是被学界忽视的考察对象,表明作者力图客观展现 18 世纪后期法国人的中国观。然而作者在评述法国两种中国观的形成过程时却忽略了当时法国的社会背景。以笔者之陋见,之所以产生上述争论与当时法国正面临发展道路的选择密切相关,这种争论可谓是激进改革派与温和改良派间的一种争论,即法国需要的是一场彻底改变社会状态的革命,还是在维持现有社会模式的基础上进行改良。主张改良的魁奈赞美中国体制的合理性,并从与自己有过交谈的旅居法国的中国人那里得到印证;而宣扬政体改革的孟德斯鸠为打破社会对封建体制的幻想,抨击包括曾一度被欧洲引以为楷模的中国体制在内的一切专制体制,亦从与自己有过交谈的旅居法国的中国人那里得到印证。在这里,与中国人接触所得到的中国印象不过成了加强他们各自主张的依据。因此,法国两种中国观的呈现与其说是宗教派别间的认知分歧,更似乎是对法国社会状态进行变革的不同主张的体现。另,姜义华在其《清末孙中山革命思想的西学渊源——上海孙中山故居西文藏书的一项审察》一文中,根据孙中山的丰厚藏书目录,探讨孙中山革命思想家的西学渊源,并再次确认孙中山在中国社会所具备的不可动摇之地位。遗憾的是在作者所运用的资料中并未出现孙中山的读书笔记抑或日记,于此难以判断孙中山是否至少通读过自己的藏书,而作者得出的结论似乎应在孙中山基本通读过个人藏书的前提下才能成立。

余论

面对历史研究，究竟是方法辅助史料完成历史叙述，还是借助史料构建完美方法。西方学者按照其注重逻辑的传统往往痴迷于研究方法论的构建，多以为历史研究不仅在于叙述过去的历史，还应对未来做出预想。这实是一项挑战极限的运动。若此，中国传统的编年体式的历史叙述，在他们的眼中自然显得平铺刻板而缺乏科学性。然而，如果我们将历史界定为“过去的状态”，那么，我们对史料乃至历史真实的追求实应凌驾于研究方法的创建之上。

参考文献

①［日］浜下武志著:《近代中国の国際的契機 : 朝貢貿易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东京大学出版会，1990 年版。

②［美］COHEN，PAUL A（柯文）著，李荣泰等译:《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回顾与前瞻》，日文版，佐藤慎一译:《知の帝国主義:オリエンタリズムと中国像》，平凡社，1988 年版。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1 年版。

③［日］沟口雄三:《方法としての中国 》，东京大学出版会，1989 年版。